



尼克松回忆录

中 册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尼克松回忆录

中册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裘克安等 译

马清槐等 校

商务印书馆

1979年·北京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Grosset & Dunlap
A Filmways Company
Publishers • New York
1 9 7 8

尼克松回忆录

中 册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裘克安等 译

马清槐等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售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15 $\frac{3}{4}$ 印张 376 千字

1979 年 1 月第 1 版 197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0 册

统一书号：3017·239 定价：1.45 元

目 录

总统职位 1969—1972.....	1
后 记.....	497

总统职位

1969—1972

1969年1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的那天，我七点三刻就醒了，365
我和帕特在我们的套间里吃过早餐以后，参加了在国务院礼堂举行的祈祷会，然后驱车前往白宫。车子徐徐转入楼前车道时，我看到约翰逊夫妇在北门廊下等着我们。

我们走进去，按照传统在红厅用了咖啡和面包卷。为了使气氛轻松些，我对汉弗莱说，“休伯特，我想今天也许应该由你而不是由我来致词吧。”

“我本来是打算这样做的，迪克，”他微笑着回答。

我从1961年的经历知道，对于一个几乎当选的落选者来说，参加这样的典礼是多么痛苦。因此，当汉弗莱如此通情达理地表现出愉快的心情时，我很受感动。

在驱车前往国会大厦的短短路途上，约翰逊一面对沿途群众招手致意，一面对谈笑风生。当天晚上，我口授的一段日记提到了他所说的一些话：

约翰逊在驱车前往国会大厦时情绪激动地谈到了马斯基和阿格纽。

他说，在前一天的晚宴上，有一群人谈论马斯基对这次竞选的贡献多么大。他——约翰逊——却回答说，所有的报纸都吹捧马斯基，可是到了选举的时候，马斯基竟以四票之差丢了缅因州，而阿格纽在争取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等州方面却立了全功，至少可以说是立了 366

大功。显然，约翰逊喜欢阿格纽，有点讨厌马斯基。

在准备宣誓时，帕特仍然捧着她在1953和1957年捧过的两本米尔豪斯家传的《圣经》。我让她翻到伊赛亚书二章四节：“他们将把剑锻制成犁，把长矛锻制成修树勾剪。各族不再向他族举起刀剑，它们都不再学习征战。”

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主持完宣誓仪式以后，我发表了就职演说。

我讲的主题是和平。我说：“历史所能赐予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的称号。这个荣誉目前正在向美国招手……。如果我们取得成功，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谈到我们这些现今活着的人时会说，我们掌握了时机，促使世界成为人类得以安居乐业的场所。这一点激励着我们献身于崇高的事业。”

当我们准备开始从国会大厦到白宫的就职游行时，我看到特工人员已经把总统专用的高级轿车的车顶盖上了。特工负责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沿途有好几百名示威者，他们已经同警察和观众发生了一些零星的冲突。

在头几条街区，欢呼的群众是友好的。到了第十二号街附近，我就看到有人高高地挥舞着抗议标语牌，前面有两行警察拚命把他们往后推。突然间，一阵棍棒、石头、啤酒瓶和类似爆竹的东西从空中向我们飞来。有一些砸中车身的侧面，弹回街上。我听到抗议的人齐声尖叫：“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必胜！”一面越共旗子举了起来，人群里有人想要把它扯掉，引起了一小阵骚乱。几秒钟后，我们拐过街角，驶入第十五号街，气氛就完全变了。华盛顿旅馆和财政部大楼门前人行道上的人群发出洪亮的欢呼声。我因为刚才被一群手执越共旗子的示威者困在车里，心里很

生气，这时便叫司机打开车顶，并且要他通知其他特工人员说，帕特和我要在车里站起来让人们看到我们。

当晚举行的四个庆祝舞会，我们都先后参加了。当我们回到白宫，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特里西娅和朱莉发现冰箱里还有约翰逊家的姑娘们剩下来的黄油松脆冰激凌和啤酒。

我在白宫住宅中央大厅里的大钢琴前坐下，弹奏了《春风瑟瑟》和我同帕特结婚以前为她创作的一首曲子。

367

当我们全家围坐在西大厅沙发上的时候，帕特愉快地出了一口长气：“这样的家可真不错。”这时大家都抬头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白宫现在是我们的家了。

白宫既是一个国家博物馆，又是一个家。那些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房间大都在一、二层，如东厅、绿厅、蓝厅、红厅和国宴大厅等。三、四层的私人住房称为官邸或住宅。这些房间的风格随着每届政府的更替而有所变化。

帕特选择了黄色、蓝色和金色来布置住宅。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加利福尼亚的色彩。特里西娅在1971年结婚以前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住的是林达·伯德·约翰逊的房间。它的窗子面向宾夕法尼亚大街和拉斐特公园。四楼上明亮通风的日光浴室曾经是肯尼迪家孩子们的教室，后来成为露西·约翰逊和林达·约翰逊的青少年专用游乐厅，现在成了我们的家庭聚会室。

尽管是住宅，也到处有历史。我想要一张普通的床来替换约翰逊用过的挂着幔围的四柱大床，人们就从仓库里给我拿来一张先是杜鲁门总统、后来是艾森豪威尔用过的床。我不禁想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政治确实已经造成了一些奇妙的同床人。

从约翰·亚当斯到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总统和他的工作班子都在白宫里工作。但是西奥多·罗斯福有六个孩子，加上他们饲养的那些狗啊、猫啊、浣熊啊、蛇啊，还有一匹小马和一头熊，地方就显得小了，因此他要求加建了西侧楼。

西侧楼实际上是一幢三层的小办公楼。一楼有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和我们称之为罗斯福室的一间会议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加盖了东侧楼，供总统的工作班子和第一夫人的工作班子办公。

虽然帕特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铺上一块由蓝色和金色组成的色彩浓艳的地毯，摆上金光闪闪的沙发和挂上金色的窗帘，使房间增加点温暖气氛，但还是显得非常严肃。因此，我决定在旧的行政办公大楼里布置一间更舒服的办公室，它和白宫只隔着一条狭窄的死胡同。记者们常把办公楼里的这间办公室称为我的“偏僻的小办公室”，其实它和椭圆形办公室几乎一样大。帕特在书架上摆满了我最爱看的书，还陈设了多年来我搜集的一些纪念品。这里有368 许多家庭照片；对我说来，最珍贵的莫过于1960年我竞选总统失败后全家搬回到加利福尼亚的那天同帕特、特里西娅和朱莉合照的那一张了。朱莉有一次写信告诉我，“我爱这么想，你把这帧照片一直放在你的写字台上，是因为它象征着我们一家人经历了这次痛苦的失败并在你担任了多年的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以后又艰难地重新开始过平民生活时所感到的天伦之乐。”我宁愿在周围摆满这些个人物品的环境里而不愿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严肃气氛中进行思考和工作。

自就任总统之初，我便以白宫三楼的林肯起居室作为晚餐后的办公室。这是林肯的两位秘书约翰·海和约翰·尼古拉用来办公的一个小房间。帕特 in 布置的时候加上了一些特殊的点缀，其中有我心爱的棕黄色丝绒面的旧安乐椅和脚凳，是从我们纽约离

新的书房里搬来的。

我要求把我任副总统时在国会大厦正式办公室里的古色古香的写字台放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们又把艾森豪威尔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用过的写字台和椅子摆在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里。自从肯尼迪决定换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任总统期间使用过的写字台以后，艾森豪威尔的那张写字台就一直放在仓库里。

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壁炉架上方，约翰逊原来挂了一幅富兰克林·D·罗斯福手持《大西洋宪章》的画像。我把它取下来换上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画的乔治·华盛顿肖像。我按照白宫的传统，亲自选定三位前任总统的画像放在内阁会议室里。我选的是艾森豪威尔、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

林登·约翰逊特别喜爱小机件和电子设备。他觉得有必要不断地了解报纸和电视对他的评论。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写字台左边靠墙的地方有一个特制的大柜子，四壁绝缘，上有厚厚的玻璃盖，里面放着两台不断地滴滴答答响着的电传收报机。柜子旁边还有一个又矮又长的柜子，里面并排放着三架大屏幕彩色电视机。通过一种特殊的遥控装置，约翰逊可以同时收看三大电视网，并且可以分别切断或接通各台的音响。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小办公室里也有同样三架一套的电视机。在总统卧室里还有一套。我对霍尔德曼说，我只要小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视机就够了，其他电视机和电传机件统统给我拆掉。

我发现约翰逊的床底下有一大堆电线。他们告诉我，有的是他的电话线，有的是电视机遥控电线，有的是电话录音机的电线。我叫他们把这些全拿走。

约翰逊还有一件特殊装置，那就是官邸里总统私人浴室的淋浴设备。这套设备由六个各式各样的喷射器和喷头组成，由一个

复杂的旋钮控制板控制。我头几次使用这套设备时，差点让喷头的水把我从淋浴分隔间里冲走，因此我叫人换上一个装在头顶上方的普通淋浴装置。

我在白宫的第一个晚上只睡了大约四个小时，清晨六点四十五分就起床了。剃胡子的时候我记起 11 月份拜访约翰逊的时候他曾经领我看过一个隐蔽的保险柜。当我打开的时候，保险柜乍看好象是空的，随后才发现顶上一格有个薄薄的文件夹，里面是情报部门前一天、即约翰逊担任总统最后一天关于越南形势的报告。

我匆匆翻阅了一下。最后一页上写着最近的伤亡数字。截至 1 月 18 日为止的那一个星期，美国人阵亡一百八十五人，伤一千二百三十七人。从 1968 年 1 月 1 日到 1969 年 1 月 18 日，共阵亡一万四千九百五十八人，伤九万五千七百九十八人。我合上文件夹，放回原处。这份报告我一直保存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为的是使自己不忘战争的惨重代价。

2 月 17 日，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前来白宫作首次正式拜访。

我对他说，我希望同他以及他的政府领导人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系。

“大使先生，你和我都了解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根本性分歧。我们也许能够解决这些分歧，也许不能够。我希望能够解决。但是，你我至少应该确保我们之间不致因为缺少联系而产生不和。”

基辛格曾建议在他和多勃雷宁之间建立一条秘密渠道。我也认为，多勃雷宁在绝对不声张的私下会谈中可能会更乐于提供一些消息，因此我们安排他悄悄地出入很少使用的东侧楼大门，这样

就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人的会面了。在一段短时间内，他们每周碰头，往往同进午餐。

当多勃雷宁说他的政府希望就限制武器问题开始进行谈判时，我表示意见说，一个方面的进展理应同其他方面的进展联系在一起。

“历史清楚地表明，武器甚或军备竞赛导致战争的可能性不如根本的政治分歧和政治问题导致战争的可能性那样大。”我说，“因此我认为，当我们开始战略武器谈判的时候，我们又不容辞地应该同时尽一切努力来缓和诸如中东、越南、柏林等剑拔弩张的地区的紧急政治形势。” 370

多勃雷宁在离去之前交给我一份来自莫斯科的长达七页的正式照会，表示苏联人准备就中东、中欧、越南和武器控制等一系列问题求得进展。

从我们想把各方面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的政策看来，这份照会似乎是个好的预兆。当然，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苏联人是否愿意把言论变成行动。

欧洲和戴高乐

2月23日，我离开华盛顿到欧洲作一次为期八天的工作访问。这是我以总统身分第一次出国。我想通过这次访问树立一条原则，那就是在和潜在的敌人谈判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和盟友商量。我还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新总统并没有完全被越南问题缠住，同时要让国内的美国人明显地看到，尽管有人反对战争，他们的总统在国外还是受到尊敬甚至热情的接待的。

尤其重要的是，我认为戴高乐总统的合作对于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打算同共产党中国开始建立新关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法

国同河内和北京都有外交关系，巴黎将是我们和他们建立秘密联络渠道的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戴高乐在最近几年变得和美国十分疏远。1966年他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迁离巴黎。我们能否利用巴黎作为我们采取主动外交行动的场所，将取决于我能否克服我们之间的疏远以及与戴高乐建立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

我逗留的第一站是布鲁塞尔。我在那里对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所说的话，为这次访问定了调子。我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礼节；为了征询意见，不是为了坚持意见；为了协商，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为了倾听和学习，并揭开我所希望的经常交换意见和看法的新篇章。”

在伦敦，我和伊丽莎白女王共进了一次午餐，并且同十九位知名的英国公民非正式地交谈了很长时间。我还和威尔逊首相在唐宁街十号一间舒适的房间里进行了单独谈话。温暖的炉火映得满室通红，威尔逊不久就背靠座椅，把两腿搁桌子上。他穿着毡拖
371 鞋。我们从美国在越南的处境谈到英国在欧洲的作用。威尔逊在访问莫斯科时曾会晤过苏联的一些领导人，他谈了对他们不同性格的印象。他说：如果勃列日涅夫生在英国，他很可能最后当上职工大会的总书记；假如柯西金是个英国人，他大概会成为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董事长。

威尔逊在唐宁街十号为我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席间出现了一种有可能变成尴尬的局面。1962年，一家英国杂志《新政治家》用“政治生活中正派作风的胜利”来形容我被帕特·布朗击败的事情。杂志当时的编辑约翰·弗里曼最近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那天晚上我和他第一次将在唐宁街一个亲切的小型社交场合相遇。

我决定直截了当地谈这件事，以消除紧张气氛。我在宴会结尾的祝酒词中说，美国新闻记者在文章里把我描写得比弗里曼的杂志所形容的还要糟糕。现在这已成为陈迹，最好是把它忘掉。我说，“归根到底，他是新的外交家，我是新的政治家。”

在座的人用手指敲着桌子喊道：“说得对，说得对！”我坐下时，威尔逊悄悄地把他的菜单塞给我，背面还写道：“这是我在四分之一世纪政治生活中所看到的最怀有善意和最豁达大度的行为。这件事证实了我的一个观点。人不能像生下来就是贵族，但有可能生下来就是个谦谦君子——象你所证明的那样。”

我们曾经担心遇到反战示威。这次旅程中发生过几次，但没有一次使伦敦、巴黎、波恩、布鲁塞尔、柏林和罗马等地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十分友好的欢迎有所减色。只要可能，我就临时下车走几步或者深入到人群中去同人们握手谈话。

我和戴高乐的一系列会谈，不论从我个人来说或者从实质上说，都是这次旅行的高潮。当“空军一号”座机在奥利机场向终点滑行时，我看见戴高乐站在舷梯旁，没有穿大衣。有人告诉过我，室外气温刚刚高于零度，但我还是立即脱掉了大衣。握手的时候，戴高乐用英语向我表示欢迎——这在他说来实际上是一种破例的亲切姿态。

当天下午我们在爱丽舍宫单独会谈，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苏联。

他说，对战后的欧洲来讲，最重大的生活现实是苏联的威胁，但是他认为苏联人已经全神贯注于对付中国。他说，“他们正在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且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而，我认为他们最后可能选择一种与西方和

解的政策。”他觉得，不管俄国人当前对缓和的倾向如何，由于他们对德国军队历来怀有戒心，他们希望缓和的倾向只会增强。

“就西方来说，”他继续说道，“我们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除非你准备打仗或者把柏林墙推倒，别无其他合意的政策。促进缓和是明智的：如果你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那就只有同对方言归于好。”

“如果俄国人开始采取行动，”我问道，“你认为他们相信美国会用战略武器作出反应吗？欧洲人是否相信我们会以大量常规地面部队来回击苏联人的袭击或袭击的威胁呢？”

“我只能代表法国人回答，”他说，“我们相信俄国人知道美国人是不会容许他们征服欧洲的。我们还相信，如果俄国人向前推进，你们也不会马上就使用核武器，因为这将意味着一种不留余地的努力，把对方所有的人都消灭干净。假如俄国人和美国人都使用战术核武器，欧洲就要毁灭。西欧和联合王国将被苏联的战术核武器所摧毁，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将毁于美国的战术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却不受损害。”

那天晚上，在爱丽舍宫举行了国宴。我和戴高乐夫人谈了话。她是一位意志坚强、性格伟大的妇女。他主要关心她的丈夫和家庭。她说，“总统的职位是暂时的，家庭却是永久的。”

次日，戴高乐和我在凡尔赛的大特丽爱依宫会谈。“路易十四曾在这间屋子里统治欧洲，”他站在一个面向好几英亩整齐花园的大窗户跟前说道。

我们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伟大民族带来的悲惨后果。他把大量的历史事实压缩成这样一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所有的国家都遭受损失。两个国家被打败了。”

我把话题转到了中国。从谈话中可以发现，他的想法和我有

雷同之处。“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他说，“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考虑到将来，”我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³⁷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他同意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那天傍晚，我们从凡尔赛回到巴黎。晚上，我举行宴会答谢戴高乐。他进一步确定了接受访问美国的邀请，并且我们一致认为，象这样的工作访问是最有好处的。我们把1970年1月或2月定为最适宜的时机。

戴高乐在当晚的祝酒词中说，“我对你了解得愈是深切——通过这次访问，你向我提供了这种我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我就愈加钦佩你作为政治家的风度和你的为人。”

我认为，他的话表达了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之间一种新的真诚谅解，而单是有了这种谅解就足以证明我的欧洲之行是值得的。

在法国的最后一天会谈中，我们讨论了越南问题。美国曾经不顾戴高乐的警告，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便深深陷入了越南。因此，会谈一开始我就问道，“总统先生，关于越南问题你看该怎么办？”

他沉吟了好长时间才开口。“总统先生，你希望我干什么呢？”他问道。“是否要我告诉你，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该怎么办？可是我并不处在你的地位！”